

母語中文譯者中譯英迴避策略研究

陳孟琳

第二語言（L2）學習者，包括母語譯入 L2 的譯者，常迴避 L2 中困難的詞彙或句子結構，作為克服溝通障礙的策略。本研究採用 Brown（1994）對迴避策略的分類，探討了母語中文的學生譯者和專業譯者在中譯英過程中的八種迴避策略。本研究採量化統計與質化分析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包含譯文文本分析、翻譯過程 Inputlog 鍵盤記錄及譯後訪談。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譯者和專業譯者均採用了所有八種迴避策略，其中上義詞和短語動詞迴避使用最頻繁。兩組譯者在具體的迴避策略使用頻率上存在顯著差異，然而，當兩組譯者在翻譯不同文本時，這些差異亦呈現變化。本研究結果發現了不同程度譯者採用的迴避策略，並深入探討了其背後隱藏的與英語學習相關的困難，對於中譯英及英語寫作教學都有一定意義。

關鍵詞：母語中文譯者、中譯英、Inputlog 鍵盤記錄、詞彙迴避、句法迴避

收件：2021 年 4 月 12 日

修改：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9 月 17 日

接受：2021 年 11 月 23 日

Avoidance Strategies Used by Native Chinese-Speaking Translators in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Meng-Lin Chen

Avoidance is a common strategy employed by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as well as in translating into their second language. This strategy helps learners to overcom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that result from their lack of proficienc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is study the eight categories of lexical and syntactic avoidance strategies identified by Brown (1994)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avoidance strategies of native Chinese-speaking masters'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heir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of two short Chinese articles. A mixed-research method that included textual analysis, keyboard and screen recordings with Inputlog, and posttranslation interviews was employ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trategies of avoiding superordinates and phrasal verbs were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the translators, who also tended to use such avoidance strategies in markedly different ways when translating distinct texts. The study elucidated numerous avoidance strategies used in 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subtl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in learning English. This study aids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at the MA level, as well as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more generally.

Keywords: native Chinese-speaking translator, Chinese-to-English translation, Inputlog keyboard record, lexical avoidance, syntactic avoidance

Received: April 12, 2021

Revised: August 10, 2021, September 17, 2021

Accepted: November 23, 2021

壹、前言

不少母語非英語的學習者在英語寫作或中譯英時，常常選擇相對簡單的句子或詞組，並迴避比較困難的語言結構，因為學習者認為使用簡單的結構比較安全，犯錯的機率低、可以在短時間內幫助學習者順利進行溝通（Ellis, 1994；Swain, 1985）。但是，迴避現象所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覷。由於使用迴避策略，學習者失去掌握新詞彙或語法的動機，因而喪失了主動學習新語言知識的契機（Blum & Levenston, 1977；Kleinmann, 1977；Laufer & Eliasson, 1993）。

迴避現象自 Schachter（1974）第一次提出之後，得到極大關注（Dulay, 1982；Ellis, 1985, 1994；Faerch & Kasper, 1980；Krashen, 1982；Larson-Freeman & Long, 1991；Odlin, 1989；Selinker, 1972；Tarone, 1980, 1981）。研究發現，在詞彙迴避方面，不同母語的學習者在使用英語短語動詞、有上下義的實詞、成語、冠詞時，似乎都存在從迴避到不迴避的發展過程（Blum & Levenston, 1977；Dagut & Laufer, 1985；Dulay, 1982；Hulstijn & Marchena, 1989；Kleinmann, 1977；Laufer & Eliasson, 1993；Li, 1996）。在句法迴避方面，學習者傾向於迴避較複雜的句子結構、如關係子句、使用並列句代替複合句，用主動語態代替被動語態，使用正式語體而迴避非正式語體（Bley-Vroman & Hounig, 1988；Chiang, 1978；Kamimoto et al., 1992；Schachter, 1974；Seliger, 1989；Zhao, 1989）。

然而，對迴避的研究多以研究寫作為主，在翻譯研究領域，因為數據收集和分析技術的進步，近年來對翻譯過程的實證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探討專業譯者和學生譯者翻譯過程差異的研究（Carl & Kay, 2011；Dragsted & Carl, 2013；Jakobsen, 2002；Olalla-Soler, 2018；Ronowicz & Imanishi, 2003；Rosa et al., 2018；Schaeffer et al., 2016），但這些研究並未對迴避現象進行專門探討。一些對迴避策略的研究也只是將翻譯當作引出（*elicitation*）數據的一種測試方式（司曉蓉，2015；Blum & Levenston, 1977；Dagut & Laufer, 1985），針對迴避現象的翻譯過程研究有待加強。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母語中文專業譯者和研究所學生譯者，在中譯英一般文件過程中使用何種迴避策略，以及各種迴避策略使用的差異。研究結果將提升我們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使用迴避策略的認識，進而對中譯英研究、英文寫作、中譯英翻譯教學及實務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採用鍵盤紀錄量化統計與譯後訪談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因其能夠提升研究數據的可靠性，在當前翻譯學實證研究中越來越多地被採用 (Alves, 2003; Mees et al., 2009; O'Brien et al., 2010; 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 Group, 2005)。

貳、文獻探討

一、背景

二十世紀 60 至 70 年代，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的學者意識到，第二語言 (L2) 的學習是一個不斷克服語言錯誤 (error) 的過程，如果學習者不犯任何錯誤反而會阻礙語言的習得，因為他們可能失去了從對錯誤的反饋 (feedback) 中受益的機會 (Brown, 1994)。早期的研究者們認為母語知識是 L2 學習中最大的障礙，學習者的絕大部分語言問題是由母語與外語之間的差異造成的，錯誤是母語干擾 (L1 interference) 的結果。他們認為，語言是一種行為，學習者將學會了的行為從一種情境轉移至另一種情境 (Lado, 1957; Littlewood, 1984)。

隨著對行為主義語言發展理論的質疑，研究者開始關注母語干擾之外的造成錯誤的原因，研究的重心從對比母語和目標語轉向研究錯誤本身 (Rintell, 1979; Trosborg, 1987)。Chomsky (1968) 指出，語言學習是一個習得規律的過程，是學習者透過自己的理解和表達來驗證或修改其輸入資料的過程。此後，Selinker (1972) 首次提出過渡語 (inter-language) 的概念，用來指在 SLA 過程中學習者在大腦中建立的關於 L2 的系統性知識。這種對錯誤看法的

改變，引發了20世紀70年代初對學習者語言錯誤研究的轉向，錯誤分析（error analysis, EA）成為了一種新的分析語言學習過程的方法（Corder, 1973）。

許多學者試圖對錯誤的種類和原因進行解釋。Dulay 與 Burt（1974）將錯誤分為三類：（1）干擾性錯誤；（2）發展性錯誤；（3）其他特殊性錯誤。Selinker（1972）更是劃分了五類錯誤：遷移錯誤、目標語規則過度概括錯誤、語言學習策略錯誤、教學遷移錯誤，以及溝通策略錯誤。Brown（1994）將錯誤的來源歸為語間錯誤、語內錯誤、情境錯誤、溝通策略錯誤等四種。由於本研究著重探討迴避現象，在此就不對錯誤的分類作詳細的比較。

二、迴避現象

迴避有各種不同解釋（Dulay, 1982；Ellis, 1985, 1994；Faerch & Kasper, 1980；Krashen, 1982；Larson-Freeman & Long, 1991；Selinker, 1972；Tarone, 1980）。依據 Krashen（1982）的看法，學習者母語規則和目標語規則的差異使學習者轉而採用目標語語法規則中他已經習得的簡單的表達方式。Selinker（1972）的過渡語理論認為，學習者對於目標語的規律作出了不正確的歸納與推論，每當理解和使用目標語出現困難時，便會使用和母語相似的語言結構、語法規則。Kleinmann（1977）、Tarone（1980, 1981）、Brown（1994）、Ellis（1994）等學者將迴避歸類為溝通策略錯誤。另外，也有研究者認為迴避策略是學習者目標語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用以解決溝通問題的一個衰減策略（reduction strategy）（Faerch & Kasper, 1980）。

迴避現象錯綜複雜，哪些情況屬於迴避現象，目前學界的意見並不統一。依據 Schachter（1974）的看法，構成迴避現象需要有三個條件：（1）學習者知道該結構的存在；（2）對該結構的使用沒有把握；（3）學習者意識到特定語境下有使用該結構的需要；（4）沒有使用該結構而採用了一個替代的結構。Kleinmann（1977）和 Seliger（1989）則認為，要區分學習者是否「迴避」錯誤，還必須考慮學習者採用替代結構是否為有意識的行動。如果學習者缺乏相關的知識，那就根本談不上迴避，僅僅是無知（ignorance）而已。

Marzouk (1995) 認為，如果學習者存在語言知識的缺乏，那麼其採用的替代策略都不屬迴避現象，而是替代策略，用來填補其空缺。Faerch 與 Kasper (1980)、Odlin (1989) 等學者則認為，迴避就是學習者目標語表達方式上與母語者的差異。Odlin (1989) 創造了「使用不足」(underproduction) 這個概念，來描述 L2 學習者對語言的使用上與目標語標準相比數量偏少的現象。如果學習者目標語與該目標語為母語者相比，存在某種語言結構的不足，那麼這種使用不足就是迴避現象。Li (1996) 依據學習者主觀上是否意識到自己在進行選擇，將迴避分為有意識的迴避 (conscious avoidance) 以及下意識的使用不足 (subconscious underproduction)，但他認為，這兩種都屬於迴避現象。Ellis (1994) 將迴避定義為：

- (一) 學習者對迴避使用的語言結構具有粗略的了解，但知道或預感到正確使用該結構比較困難。
- (二) 學習者具備使用該語言結構的知識，但感覺在特定情況下使用該結構比較困難。
- (三) 學習者具備該語言結構的知識，並且可以準確使用該結構，但因為使用該結構不符合其本國的風俗習慣而迴避使用該結構。

Ellis (1994) 所定義的迴避是，在可以使用某種語言結構的情況下，學習者至少粗略了解但卻未使用的語言結構。綜觀對迴避現象的各種論述，Faerch 與 Kasper (1980)、Odlin (1989) 和 Li (1996) 所定義的迴避顯然比 Ellis (1994) 的更為寬泛，而 Marzouk (1995) 的定義又比 Ellis (1994) 的更加嚴格。Ellis 的定義比較折中，因而也為本研究所採用。

三、迴避策略分類

自 1974 年 Schachter 首次顯示迴避現象以來，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迴避策略的分類方式。Tarone (1981, p. 286) 提出，迴避策略包括迴避主題 (topic avoidance) 和捨棄內容 (message abandonment) 兩種類型。Brown (1994) 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給出了一個完整且相對簡單，卻有別於其他類型的

迴避策略分類方式。Brown (1994, pp. 118-120) 將迴避策略分為四種：句法 (syntactic) 迴避、詞彙 (lexical) 迴避、語音 (phonological) 迴避及話題 (topic) 迴避。其中句法迴避和詞彙迴避指學習者迴避使用目標語中的句子或詞彙。例如：

學習者：I lost my road.

母語者：You lost your road?

學習者：Uh...I lost. I lost. I got lost.

因為沒有想到“way”這個字，學習者完全避開了詞彙項目“road”（道路）。語音迴避是指因發音問題而造成的迴避。例如，日本人可能會避免使用“rally”這個詞（因為它的語音困難），而只是簡單地說“hit the ball”。Brown (1994) 的話題迴避包含一系列方法：對主題進行調整，假裝不理解，根本不回應，或明顯放棄訊息。

上述 Tarone (1981) 及 Faerch 與 Kasper (1980) 的分類方式較為適合口語交談中迴避策略的分析，而 Brown (1994) 分類方式則較為平衡，既包含可用於分析口語交談的語音迴避和話題迴避，也包含可用於分析書面語的句法迴避和詞彙迴避。因為本研究針對書面語，故將採用 Brown (1994) 的分類方式。

四、對於迴避現象的研究

研究人員長期以來對學習者詞彙、句法方面的迴避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包含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及不同程度的學習者。

(一) 詞彙方面

在詞彙迴避研究方面，Blum 與 Levenston (1977) 的研究可謂經典。他們使用 L2 學習者書面語、母語者書面語以及從希伯來語翻譯成英語的書面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他們發現學習者以下五個詞彙迴避現象，主要表現在：上義詞 (superordinate)、使用近似的表達方法 (approximation)、使用同義詞 (synonym)、母語遷移 (transfer)、迂迴說法 (circumlocution) 或改述

(paraphrase)。

1. 使用上義詞代替下義詞：使用上義詞“doctor”來替代“surgeon”和“dentist”。
2. 使用近似的表達方式替代不會的詞：用“chain”（鐵鏈）替代不會用的“fetter”（腳鐐）。
3. 使用同義詞：表達「使用」概念時，多用“use”而很少用“utilize”。
4. 母語的遷移：用“yellow books”來表達「黃色書籍」，主要是受到母語思維的影響所致。
5. 迂迴說法或改述：想要表達「子孫後代」，可是不知道“descendant”，於是便用“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子女和孫子）替代。

在具體的詞彙迴避研究方面，對英語短語動詞（phrasal verbs）的迴避受到比較多的關注（Dagut & Laufer, 1985；Dulay, 1982；Hulstijn & Marchena, 1989；Laufer & Eliasson, 1993；Li, 1996）。Dagut 與 Laufer（1985）研究了三組母語為希伯來語的中級英語學習者使用短語動詞的情況，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研究對象有迴避使用短語動詞的傾向，他們更喜歡使用意義相近的單個動詞。Hulstijn 與 Marchena（1989）將 Dagut 與 Laufer（1985）的方法用於測試高級、中級二組母語為荷蘭語的英語學習者如何使用短語動詞，研究結果發現，中級組有迴避英語短語動詞的傾向，而高級組沒有，二組都有使用意義相近的單個動詞的傾向。Laufer 與 Eliasson（1993）則發現，母語為瑞典語的高能力英語學習者不迴避英語短語動詞。

對母語是中文的學習者，Liao 與 Fukuya（2004）以留學海外的中國英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把他們分為中級組和高級組，結果表明，中級組迴避英語短語動詞，高級組則沒有。趙鵬芳（2011）基於中國學習者英語語料庫（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 CLEC）和英美學生作文語料庫（Louvain Corpus of Native English Essays, LOCNESS），對英語短語動詞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中國學習者有迴避使用短語動詞，隨著學習者英語能力的提高，使用短語動詞的頻率逐步提高，但仍大大低於母語使用者。然而，也有少數研究得出相反的結果。例如，國偉（2013）比較了 21 位母語英語者及 64 位

中國大學一年級學生英語短語動詞使用上的差異。其研究發現，後者並沒有迴避英語短語動詞，但是該研究僅僅使用 15 組英語短語動詞，且研究對象皆為同一所大學的大一學生，研究結果可能有誤差。因此，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學習者的母語當中是否存在短語動詞，學習者對短語動詞的使用似乎都存在一個從迴避到不迴避的發展過程。隨著學習者英語能力的提高，迴避現象就會逐漸消失。

除此之外，在學習者其它具體詞彙迴避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和成果，如對介系詞 (*preposition*) 的迴避研究 (Ringbom, 1987)；對英語成語 (*idiom*) 的迴避研究 (Irujo, 1993)；對英語冠詞 (*article*) 的迴避現象研究 (Ringbom, 1987)；對不定詞補語 (*infinitive complement*) 的迴避研究 (Kleinmann, 1977)。這些研究從不同程度上相互印證了學習者採用詞彙迴避策略。

(二) 句法方面

在使用英語句型方面，學習者也表現出一些迴避現象。其中，對英語關係子句 (*relative clause*) 的迴避現象受到最多關注 (Bley-Vroman & Houghton, 1988；Chiang, 1978；Kamimoto et al., 1992；Li, 1996；Schachter, 1974；Zhao, 1989)。Schachter (1974) 研究了中國、日本、阿拉伯和波斯的四組研究對象對英語關係子句的使用，以一組美國人作為對照組。從作文中看，中國和日本的英語學習者對英語關係子句的使用 (中國學習者 76 句，日本學習者 63 句) 明顯少於英語為母語的美國人 (173 句)。Schachter (1974) 認為，造成迴避的原因是中、日、英關係子句上的差異。Chiang (1978) 比較了中國、日本、波斯和西班牙英語學習者與母語英語者關係子句的使用，其研究證實各組學習者都迴避關係子句的使用，儘管迴避的程度有所不同。在針對關係子句的迴避現象方面，近期仍不時有新的研究結果出現 (金曉玲、陳卓, 2011；蔣秀玲, 2014)。例如，蔣秀玲 (2014) 研究了三組中國學習者對六種關係子句的掌握情況後發現，並不是所有學習者都刻意「迴避」使用關係子句。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針對迴避被動語態 (Kleinmann, 1977；Marzouk,

1995；Seliger, 1989）和現在進行時態（*present progressive*）（Kleinmann, 1977）。Kleinmann（1977）研究了母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英語學習者對四種語言結構的迴避策略：被動語態、現在進行時態、不定詞補語和直接受詞代名詞（*direct-object pronoun*），因而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實驗結果表明，學習者迴避使用的語言結構和預測的困難程度一致。

Kleinmann（1977）發現，學習者對英語語法不夠熟練，也會迴避特定句式，他們會用簡單句代替複雜句；使用“*as soon as...*”，而少用“*No sooner... than...*”；多使用正常語序“*I seldom smoke.*”，而少用倒裝句“*Seldom do I smoke.*”；用並列句代替複合句；用主動語態代替被動語態，傾向使用正式語體而迴避非正式語體。

母語是中文的學習者也有類似的迴避現象。例如，司曉蓉（2015）發現，不同英語能力的大二學生故意迴避英語分詞結構（*participle construction*），但隨著英語能力的提升，迴避傾向隨之減弱。這些研究分析了不同的語言結構，研究角度不同，研究對象也不同，但研究結果都指出，學習者不僅迴避關係子句，而且還迴避其他形式的語法結構，從而強化了 Schachter（1974）有關學習者迴避英語句法結構的主張。

綜觀針對迴避現象的研究，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不同方面揭示了 L2 習得的規律和學習者的特點。但因為實驗和觀察角度的不同，結論也不完全一致，學習者傾向於迴避使用哪些其他的語言結構也有待於進一步的調查。目前，國內對迴避現象研究並不多，Banfi（2004）研究了母語中文學習者學習義大利語時迴避關係子句的現象。林慧如（2009）在探討日譯中時，將迴避策略視為簡化策略的一種。

五、對於迴避現象的翻譯過程研究

從翻譯的角度對迴避現象進行研究，比單純從第二語言習得角度能夠提供更深入的看法，因為翻譯，尤其是譯入譯者的二語言，迫使譯者在使用第二語時，「冒險進入未知的 L2 領域」（Laviosa, 2014, p. 31），譯者在翻譯

過程中也比較不容易躲在迴避策略的後面。近年來，翻譯過程研究中陸續出現一些比較專業譯者（有經驗譯者）和學生譯者（無經驗譯者）的研究（Carl & Kay, 2011；Dragsted & Carl, 2013；Jakobsen, 2002；Olalla-Soler, 2018；Ronowicz & Imanishi, 2003；Rosa et al., 2018；Schaeffer et al., 2016）。這些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對翻譯過程的比較新穎的看法和實證證據。例如，Carl 與 Kay（2011）透過測量翻譯過程譯者注視的時間和打字的時間，發現專業譯者比較專注於閱讀原文和翻譯，而學生譯者則頻繁交替地看原文、做翻譯。Olalla-Soler（2018）比較了 38 名學生譯者和十名專業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查詢操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譯者比專業譯者查詢所需要的資源更多。Dragsted 與 Carl（2013）分析 12 名專業譯者和 12 名學生譯者的翻譯行為特徵，他們發現，譯者翻譯行為基本保持恆定，不依原文的難度而變化，而且依據翻譯行為特徵，不論是專業譯者還是學生譯者都可以分為關注局部（locally-oriented）和關注全域（globally-oriented）兩類。這些研究都為我們揭示了專業譯者和學生譯者在具體翻譯行為上的差異，有助於翻譯訓練中採用更有效的方法幫助學生譯者提升翻譯品質。然而，也許是因為這類研究在數據收集中都免不了需要用到各種先進的設備和軟體，如眼動儀、鍵盤記錄分析等等，所以研究數量不多，且分散在上述不同的議題上，彼此之間能夠相互印證的研究也不多。對於迴避現象，目前尚未有專門研究對專業譯者和學生譯者進行比較。

另外，一些對迴避現象的研究也觸及翻譯中迴避現象（Dagut & Laufer, 1985；Ghabanchi & Goudarzi, 2012；Laufer, 2000；You, 1999）。例如，Dagut 與 Laufer（1985）在研究短語動詞的迴避現象時，用了 900 個句子給學生進行翻譯。You（1999）讓三組教育背景不同的韓國英語學習者韓譯英平行結構和比喻性的動詞，研究韓國學習者對於短語動詞的迴避現象。Laufer（2000）用填充翻譯測試希伯來語學習者對成語的迴避現象。雖然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翻譯中的迴避現象提供了一些有意義的看法，但這些研究的重點並不在於分析翻譯過程中的迴避情況，而是在於 L2 學習者習得某些具

體的語言結構。

對於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譯者是否有採取迴避的翻譯策略，專業譯者和學生譯者是否有所不同等問題，迄今為止，Scarpa (2020) 的總結也許是最全面的。她指出，翻譯過程中新手和專業譯者存在眾多差異。前者除了認知節奏不穩定，翻譯速度慢之外，在選擇某些翻譯策略時甚至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例如，對於專業譯者和新手譯者而言，直譯都是其翻譯策略的第一選項，前者讓直譯在腦海中保持預設狀態，而後者則傾向於在採用完全逐字翻譯或用詞彙變體的普遍修辭慣例 (universal rhetorical convention) 兩個極端策略進行翻譯。Scarpa 認為，新手選擇逐字翻譯，完全忘記整個文本，是一種規避風險的策略，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翻譯能力普遍缺乏信心，害怕處理有難度的 ST 單元。另外，在使用釋義 (paraphrasing) 這一普遍的翻譯方法時，專業譯者更頻繁地使用「常規化」(routinised) 決策 (50%)，無意識和 (半) 自動地使用「反思／構建」(reflected/constructed) 等決策過程 (72%)，遠高於學生譯者。依照 Scarpa 的看法，翻譯策略的選擇 (例如，直譯和釋義) 與譯者的專業翻譯能力之間存在關聯。依據 Swain (1985) 的「輸出假設」理論，學習者必須經過大量的語言實踐活動才能內化輸入的語言，翻譯入 L2 和 L2 寫作均為幫助學習者內化語言輸入的良好方式 (Göpferich, 2009)。因此，雖然以往研究沒有直接針對迴避策略，但我們相信從母語譯入 L2 過程中，迴避策略的使用與譯者翻譯能力也可能存在一定關聯。弄清楚這些關聯，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有的放矢，幫助學生克服這些溝通障礙。正如 Wongranu (2017) 指出，害怕犯錯反而是造成翻譯錯誤的主要原因，促進無經驗的譯者不斷反思，就能幫助其提高翻譯能力 (Ducasse & Maher, 2020)。

以上文獻探討的結果顯示，L2 寫作中的詞語和句法迴避現象受到 L2 發展的影響，與學習者的英語能力存在負相關的關係，在譯入 L2 的翻譯過程中，前人研究尚未探討翻譯能力與迴避現象之間的關聯。我們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一) 不同翻譯能力的譯者在中譯英過程中是否採用迴避策略？他們採用了

哪些詞彙、句法迴避策略？

(二) 不同翻譯能力的譯者在中譯英過程中採用的迴避策略是否相同？

(三) 翻譯能力是否與各迴避策略的多寡存在負相關？

本研究以實證的方式分析母語中文譯者在中譯英翻譯中迴避詞彙或句法結構的現象，將對英語語法教學和翻譯教學提供有益的實證依據，進而找出解決對策，提高英語和翻譯教學效率，促進學生語言習得和翻譯能力的提升。

參、研究方法

為了有效收集數據，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方法，利用鍵盤記錄和錄影重播，了解研究對象翻譯過程中迴避策略的使用情況，再透過訪談及對譯文文本分析，評估研究對象是否確實使用了迴避策略，綜合對各種數據的分析，最後回答研究問題。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由臺灣兩所翻譯研究所在讀研究生和專業譯者各 20 名組成。學生組標記為 A 組，要求全部具有相當於多益 850 分以上的英語能力，並全部接受過系統的翻譯指導；專業譯者組標記為 B 組，要求全部具有研究所畢業的學歷，相當於多益 900 分以上的英語能力，並全部具有五年以上翻譯經驗，因而 B 組為高能力組。另外，兩組母語均為中文。

二、翻譯原文

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將二篇中文翻譯成英語，該二篇文章均不涉及專業內容，字數分別為 385 字和 382 字。翻譯時間共 140 分鐘，二篇分別計時，各 70 分鐘，中間休息十分鐘。在翻譯過程中，研究對象可以使用任何網路查詢工具。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Inputlog (Leijten & Van Waes, 2006) 記錄研究對象整個翻譯過程，包括修改、刪除、增加、剪裁、複製、滑鼠移動等文字編輯。Inputlog 重播文字輸入過程的功能用於判定譯者是否使用迴避策略。另外，Inputlog 軟體在後端運行，對譯者干擾較少。本研究 Inputlog 記錄的停頓門檻採預設的 2,200ms。

四、數據蒐集及迴避策略判定

本研究搜集到的資料包括：

- (一) 譯文。
- (二) 鍵盤及滑鼠活動及時間。
- (三) 查詢網路翻譯工具的活動及時間。
- (四) 停頓時間。

研究對象完成翻譯後，會立即接受訪談，以確定其是否採取迴避策略。訪談涉及的詞彙迴避策略為上義詞、近似表達法、同義詞、母語遷移、迂迴或改述、迴避短語動詞，句法迴避策略為關係子句和被動語態。

我們訪談前先將每篇原文分為十個句段，從每個句段中挑選出實詞、動詞、和需用英語關係子句表達的限定成分，為實詞準備好上義詞、下義詞、近似表達、以及同義詞各二到三個，為每一個動詞準備好短語動詞，並將可用關係子句表達的限定成分以及需用被動語態表達之處標示出來。在訪談中，我們就這些實詞、動詞、限定成分、語態，結合研究對象的譯文，詢問研究對象翻譯時採取的策略。例如，下句是中文原文中的一個句段：「或許偶爾會有某個機緣、某個場景會留存在孩子的腦海中，一輩子陪伴著他們，當他們挫折困頓、憂傷沮喪，甚至感覺世界就要崩毀時，這些浮現腦海的記憶，可以適時地撫慰他們，成為支撐他們繼續前進的動力。像這種親子相處的美好回憶，可以稱為『魔幻時刻』」。

經過訪談前處理之後，我們抽取的實詞包括：機緣、場景、腦海、記憶、動力、回憶等；動詞包括：留存、陪伴、挫折困頓、感覺、崩毀、撫慰、成為、支撐、稱為；限定成分為畫底線部分；被動語態包括：可以被稱為「魔幻時刻」。結合譯者的譯文，我們訪談時的問題如下：

1. 對原文中機緣、場景、腦海、記憶、動力、回憶的翻譯有困難嗎？
2. 如果譯者沒有翻譯其中一項，則詢問為什麼沒有翻譯，如果是因為不會翻譯或是漏譯則不計為迴避策略，因不會而放棄翻譯雖然從廣義上講也是一種迴避策略，但並不是本研究所分析的語言使用上的迴避策略，而漏譯則更加無法進一步判斷是否在迴避。如將場景譯為“site”，我們就問譯者知不知道“scene”、“setting”、“situation”等詞語，如果譯者知道，則計為用同義詞的迴避策略。
3. 我們繼續問譯者動詞的使用。例如，譯者將「留存」翻譯為“stay”，我們就問譯者是否知道“hang around”、“stay put”等短語動詞。同理，如果譯者不知道，則不計為迴避短語動詞，如果知道則進一步了解為何不使用短語動詞，並計為迴避短語動詞一次。
4. 我們接下來詢問譯者被動語態的使用。因為被動語態是 A、B 兩組譯者皆應掌握的英語語法，如果沒有將「被稱為」用被動語態翻譯出來，則直接詢問為什麼不翻譯，不會翻譯或是漏譯同理不標記為迴避策略。如果翻譯成“We call it...”，則計為迴避策略（使用主動語態替代被動語態）。
5. 針對原文中畫底線部分，我們看譯者是否使用關係子句進行翻譯，因為關係子句也是 A、B 組譯者早已應該具備的語法知識，如果沒有使用關係子句則計為迴避策略。

在完成訪談之後，我們使用 Inputlog 重播譯者翻譯過程，驗證譯者在遇到上述實詞、動詞、修飾成分、被動語態時，是否有採取對應的迴避行為，如停頓、修改等。

五、數據分析

在完成迴避策略的判定之後，我們統計各組迴避策略的使用的頻率和數量，最後以 SPSS 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T-test)，信心水準取 95%，分析各組迴避策略的使用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對於研究問題三，我們採用二分類迴歸分析 (binary regression)，以確定譯者翻譯能力與使用迴避策略之間可能的關聯性。

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問題一：不同翻譯能力的譯者在中譯英過程中是否採用迴避策略？他們採用了哪些詞彙、句法迴避策略？

我們先以組別為單位，對兩組譯者中譯英過程資料進行整體描述和比較。圖 1 呈現兩組譯者之全部處理時間、全部停頓時間、積極寫作時間，圖中數字單位均為秒。

圖 1

兩組譯者全部處理時間、全部停頓時間、積極寫作時間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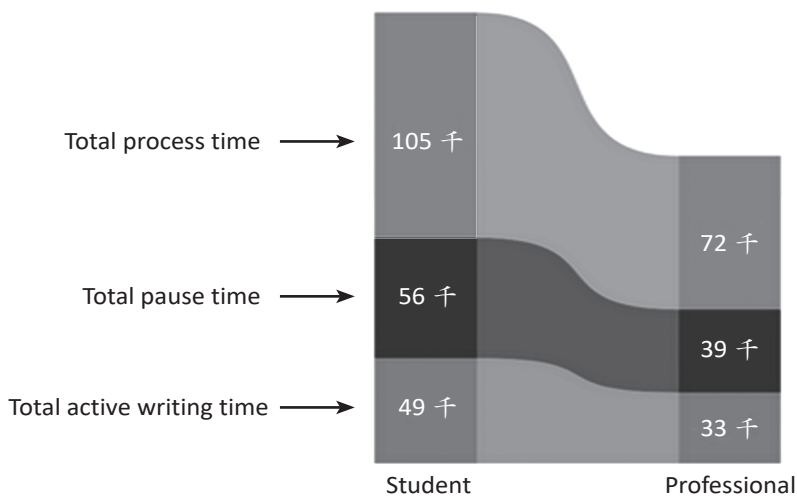


表 1 呈現全部處理時間、全部停頓時間、積極寫作時間、停頓時間所占全部翻譯時間的百分比、以及停頓總次數的值（本研究中每位譯者翻譯兩篇文章，在統計時計為不同的篇數，因為表 1 及表 3 是針對所有案例的統計，故所呈現的篇數為 40）。從該表中可以看到，A、B 組在全部處理時間、全部停頓時間、積極寫作時間及停頓的總次數等指標上都有很大的差異。A 組在這幾項指標上通常都比 B 組的平均值要高，只有在停頓時間所占全部翻譯時間百分比這一指標上，A 組（51.53%）和 B 組（52.28%）相差無幾。這說明，A、B 兩組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幾乎一半多的時間都在停頓。

表 1
翻譯過程比較

	群組統計量				
	群組	篇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全部處理時間 (s)	學生譯者	40	2627.82	787.410	124.500
	專業譯者	40	1791.89	420.452	66.479
全部停頓時間 (s)	學生譯者	40	1401.42	712.269	112.620
	專業譯者	40	964.63	372.309	58.867
積極寫作時間 (s)	學生譯者	40	1226.40	396.674	62.720
	專業譯者	40	827.26	216.882	34.292
停頓時間比例	學生譯者	40	0.515	0.157	0.024
	專業譯者	40	0.522	0.121	0.019
停頓的總次數	學生譯者	40	146.200	53.788	8.504
	專業譯者	40	92.825	42.023	6.644

圖 2

學生譯者的翻譯過程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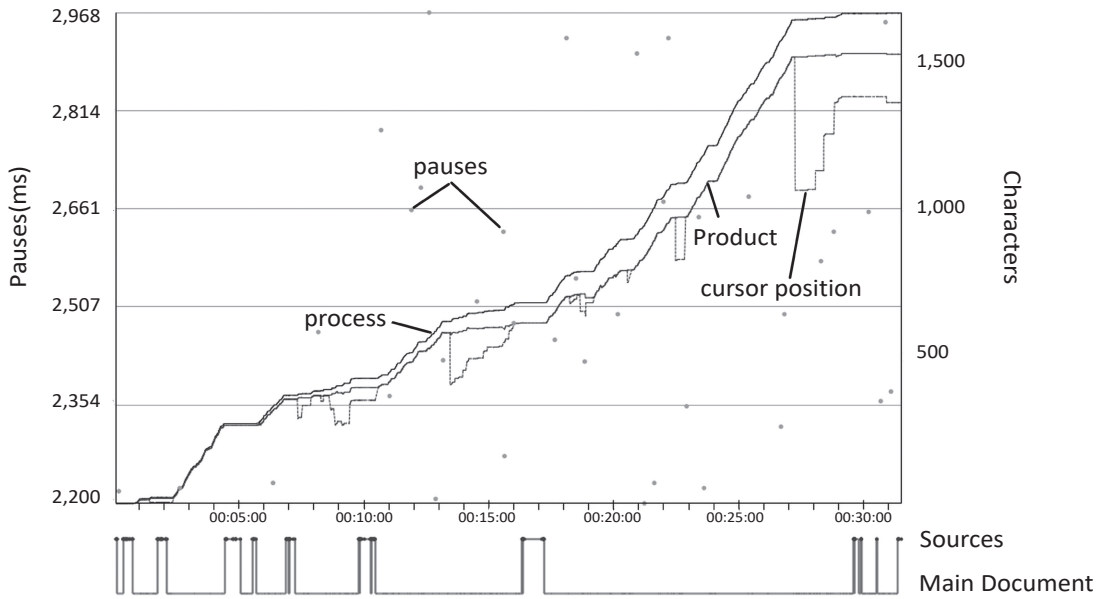


圖 3

專業譯者的翻譯過程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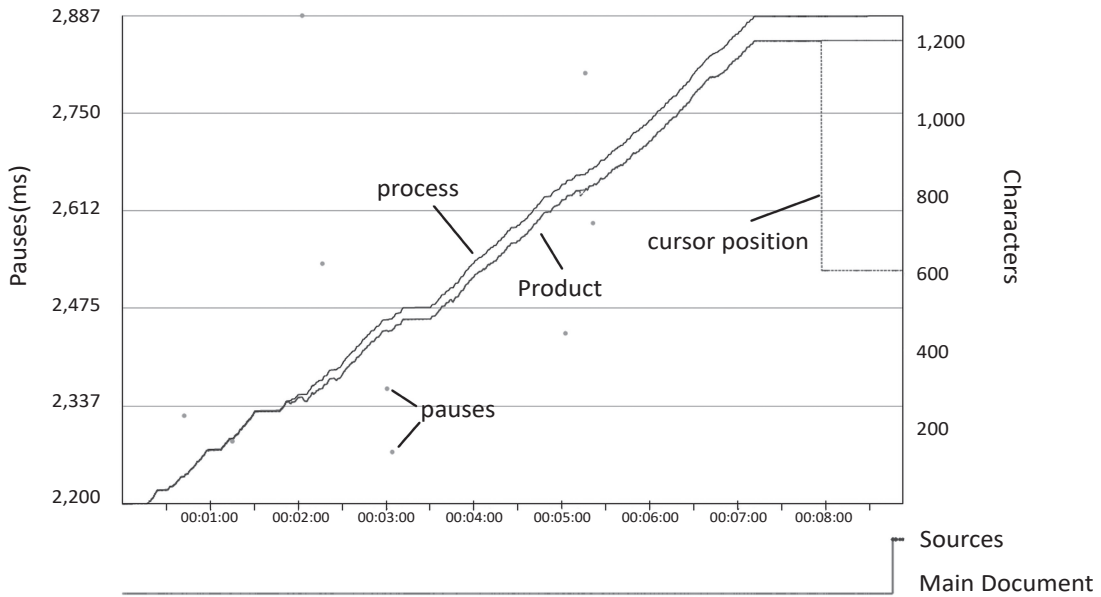


圖 2 和圖 3 分別是 A、B 組翻譯過程的例子。圖中的圓點代表翻譯過程中的停頓。這兩張圖顯示，B 組超過 2,200ms 的停頓（Inputlog 預設）遠遠低於 A 組。而進一步的獨立樣本 T 檢定這顯示，除了停頓時間所占全部翻譯時間百分比這一項之外（ $p=0.812 > 0.05$ ），兩組譯者其他各項指標的差異均達顯著（ $p < 0.05$ ），如表 2 所示。

表 2
翻譯過程差異

	獨立樣本檢定								
	Levene 檢定				平均值等式的 <i>t</i> 檢定				
	<i>F</i>	顯著性	<i>t</i>	自由度	顯著性	平均值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全部處理時間	7.636	0.007	5.923	78	0.000	835.931	141.138	554.947	1116.914
全部停頓時間	7.615	0.007	3.437	78	0.001	436.787	127.077	183.796	689.778
積極寫作時間	8.986	0.004	5.584	78	0.000	399.144	71.482	256.834	541.454
停頓時間比例	3.103	0.082	-0.239	78	0.812	-0.007	0.031	-0.070	0.055
停頓的總次數	0.978	0.326	4.946	78	0.000	53.375	10.792	31.888	74.861

我們針對鍵盤輸入顯示的停頓之處對譯者譯後訪談，進一步釐清了在這些停頓中，哪一些停頓之處是譯者在思考翻譯方法，或是在思考迴避的策略。表 3 中的第一列為本研究所判定的譯者因採用迴避策略而作出的停頓的總次數，分別以 A、B 組進行比較，第二列至第九列為採用具體迴避策略所引起的停頓次數，這些迴避策略包括上義詞、近似表達法、同義詞、母語遷移、迂迴或改述、迴避短語動詞、關係子句和被動語態等八項。表 3 顯示，A 組翻譯每篇文章時平均有 21（±12）次的停頓是在考慮採用迴避策略，而 B 組則只有八次（±6）。其中，A 組採用最多是短語動詞迴避（3.55）和上義詞迴避策略（3.08），B 組對每種迴避策略的採用均未達到兩次，最高的為短語動詞（1.78），如表中灰底之處所示。

表 3

迴避策略的使用

	群組統計量				
	群組	篇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迴避停頓的總次數	學生譯者	40	21.13	12.288	1.943
	專業譯者	40	8.20	6.136	0.970
上義詞停頓	學生譯者	40	3.08	1.966	0.311
	專業譯者	40	1.23	1.097	0.174
近似表達法停頓	學生譯者	40	2.78	2.444	0.386
	專業譯者	40	1.43	1.357	0.214
同義詞停頓	學生譯者	40	2.43	2.086	0.330
	專業譯者	40	1.50	1.485	0.235
母語遷移停頓	學生譯者	40	2.50	2.309	0.365
	專業譯者	40	0.85	1.210	0.191
迂迴或改述停頓	學生譯者	40	1.90	2.318	0.367
	專業譯者	40	0.73	1.154	0.183
迴避短語動詞停頓	學生譯者	40	3.55	2.364	0.374
	專業譯者	40	1.78	1.271	0.201
關係子句停頓	學生譯者	40	2.50	2.219	0.351
	專業譯者	40	0.55	0.677	0.107
被動語態停頓	學生譯者	40	2.38	2.204	0.348
	專業譯者	40	0.18	0.446	0.071

二、研究問題二：不同翻譯能力的譯者在中譯英過程中採用的迴避策略是否相同？

我們進一步將兩組譯者採用的迴避策略總次數和各項迴避策略進行平均數 T 檢定，結果如表 4 所示。表 4 是我們將兩篇翻譯一併分析的結果，該結果顯示，兩組譯者所採用的迴避策略總次數以及採用每一項迴避策略的次數都有顯著差異 ($p < 0.05$)。

表 4
兩組譯者迴避策略整體差異

	獨立樣本檢定								
	Levene 檢定			平均值等式的 t 檢定					
	F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迴避停頓總次數	19.737	0.000	5.952	78	0.000	12.925	2.172	8.602	17.248
上義詞停頓	9.019	0.004	5.196	78	0.000	1.850	0.356	1.141	2.559
近似表達停頓	7.775	0.007	3.054	78	0.003	1.350	0.442	0.470	2.230
同義詞停頓	5.561	0.021	2.284	78	0.025	0.925	0.405	0.119	1.731
母語遷移停頓	13.198	0.000	4.003	78	0.000	1.650	0.412	0.829	2.471
迂迴改述停頓	12.116	0.001	2.869	78	0.005	1.175	0.409	0.360	1.990
迴避短語動詞停頓	11.852	0.001	4.183	78	0.000	1.775	0.424	0.930	2.620
關係子句停頓	41.434	0.000	5.316	78	0.000	1.950	0.367	1.220	2.680
被動語態停頓	73.268	0.000	6.189	78	0.000	2.200	0.355	1.492	2.908

但如果分別對兩篇翻譯進行分析，則兩組譯者僅有部分差異顯著。表 5 是翻譯第一篇文章時，兩組譯者採用迴避策略的總次數及每一項迴避策略的次數，其平均數 T 檢定的結果（表 6）顯示，兩組譯者所採取的近似表達法、

同義詞、迂迴或改述等迴避策略的次數並沒有顯著差異（表 6 中灰底處的 p 值均大於 0.05）。

表 5

兩組譯者第一篇翻譯中迴避策略

群組統計量 ^a					
	群組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迴避停頓的總次數	學生譯者	20	20.95	11.142	2.492
	專業譯者	20	8.05	6.485	1.450
上義詞停頓	學生譯者	20	2.95	2.188	0.489
	專業譯者	20	0.90	1.071	0.240
近似表達法停頓	學生譯者	20	2.35	1.872	0.418
	專業譯者	20	1.70	1.302	0.291
同義詞停頓	學生譯者	20	2.45	1.986	0.444
	專業譯者	20	1.50	1.504	0.336
母語遷移停頓	學生譯者	20	2.30	2.155	0.482
	專業譯者	20	0.95	1.276	0.285
迂迴或改述停頓	學生譯者	20	1.60	2.113	0.472
	專業譯者	20	0.65	1.040	0.233
迴避短語動詞停頓	學生譯者	20	4.05	2.114	0.473
	專業譯者	20	1.80	1.281	0.287
關係子句停頓	學生譯者	20	2.50	2.164	0.484
	專業譯者	20	0.45	0.510	0.114
被動語態停頓	學生譯者	20	2.70	2.055	0.459
	專業譯者	20	0.20	0.410	0.092

a.session=1

表 6

兩組譯者第一篇翻譯中迴避策略差異

	獨立樣本檢定 ^a									
	Levene 檢定				平均值等式的 t 檢定					
	F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平均值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迴避停頓的總次數	5.405	0.026	4.475	38	0.000	12.900	2.883	7.064	18.736	
上義詞停頓	7.778	0.008	3.763	38	0.001	2.050	0.545	0.947	3.153	
近似表達法停頓	3.485	0.070	1.275	38	0.210	0.650	0.510	-0.382	1.682	
同義詞停頓	2.081	0.157	1.705	38	0.096	0.950	0.557	-0.178	2.078	
母語遷移停頓	5.606	0.023	2.411	38	0.021	1.350	0.560	0.216	2.484	
迂迴或改述停頓	6.589	0.014	1.804	38	0.079	0.950	0.527	-0.116	2.016	
迴避短語動詞停頓	3.459	0.071	4.070	38	0.000	2.250	0.553	1.131	3.369	
關係子句停頓	21.530	0.000	4.123	38	0.000	2.050	0.497	1.043	3.057	
被動語態停頓	29.435	0.000	5.336	38	0.000	2.500	0.468	1.552	3.448	

a.session=1

我們用同樣方式檢定了兩組譯者在第二篇翻譯過程中所採用的各項迴避策略次數，結果如表 7、表 8 所示。結果顯示，兩組譯者在母語遷移及迴避短語動詞兩項迴避策略使用次數上沒有顯著差異（ $p \geq 0.05$ ，表 8 中灰底之處），而在其他迴避策略的使用次數上均有顯著差異（ $p < 0.05$ ）。

表 7

兩組譯者第二篇翻譯中迴避策略

	群組統計量 ^a				
	群組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迴避停頓的總次數	學生譯者	20	21.30	13.627	3.047
	專業譯者	20	8.35	5.932	1.326
上義詞停頓	學生譯者	20	3.20	1.765	0.395
	專業譯者	20	1.55	1.050	0.235
近似表達法停頓	學生譯者	20	3.20	2.895	0.647
	專業譯者	20	1.15	1.387	0.310
同義詞停頓	學生譯者	20	2.40	2.234	0.499
	專業譯者	20	1.50	1.504	0.336
母語遷移停頓	學生譯者	20	2.70	2.494	0.558
	專業譯者	20	0.75	1.164	0.260
迂迴或改述停頓	學生譯者	20	2.20	2.526	0.565
	專業譯者	20	0.80	1.281	0.287
迴避短語動詞停頓	學生譯者	20	3.05	2.544	0.569
	專業譯者	20	1.75	1.293	0.289
關係子句停頓	學生譯者	20	2.50	2.328	0.521
	專業譯者	20	0.65	0.813	0.182
被動語態停頓	學生譯者	20	2.05	2.350	0.526
	專業譯者	20	0.15	0.489	0.109

a.session=2

表 8

兩組譯者第二篇翻譯中迴避策略差異

	獨立樣本檢定 ^a								
	Levene 檢定			平均值等式的 t 檢定					
	F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平均值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迴避停頓的總次數	15.576	0.000	3.897	38	0.000	12.950	3.323	6.222	19.678
上義詞停頓	3.443	0.071	3.593	38	0.001	1.650	0.459	0.720	2.580
近似表達法停頓	6.741	0.013	2.856	38	0.007	2.050	0.718	0.597	3.503
同義詞停頓	3.449	0.008	1.495	38	0.003	0.900	0.602	-0.319	2.119
母語遷移停頓	7.950	0.071	3.168	38	0.143	1.950	0.615	0.704	3.196
迂迴或改述停頓	5.963	0.019	2.211	38	0.033	1.400	0.633	0.118	2.682
迴避短語動詞停頓	5.436	0.025	2.037	38	0.049	1.300	0.638	0.008	2.592
關係子句停頓	19.798	0.000	3.355	38	0.002	1.850	0.551	0.734	2.966
被動語態停頓	25.125	0.000	3.539	38	0.001	1.900	0.537	0.813	2.987

a.session=2

三、研究問題三：翻譯能力是否與各迴避策略的多寡存在負相關？

本研究分組變量為 A、B 二分類，採用各種迴避策略的次數為自變量。我們採用二分類 Logistic 迴歸模型分析二分類分組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關係。

表 9

翻譯能力是否與各迴避策略模型

模型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卡方檢定	自由度	顯著性
	步驟	6.791	1	0.009
步驟 2	區塊	36.846	2	0.000
	模型	36.846	2	0.000

- (一) 表 9 為 Omnibus 檢定，輸出了 Logistic 迴歸模型中所有參數是否均為 0 的似然比檢驗結果。 $p < 0.05$ 表示本次擬合的模型中，所納入的變量中至少有一個的 *OR* (odds ratio) 值有統計學意義，即模型總體有意義。
- (二) Hosmer 與 Lemeshow 檢定 (表 10) 表明模型的擬合優度。因為 p 值不小於檢驗水準 (即 $p > 0.05$)，故當前數據中的資料已經被充分提取，模型擬合度較高。

表 10

翻譯能力是否與各迴避策略模型擬合度

Hosmer 與 Lemeshow 檢定				
步驟	卡方檢定	自由度	顯著性	
2	10.766	8	0.215	

(三) 方程式中的變數

本次統計過程中篩選變量的方式是 Forward LR 法，方程式中的變數 (表 11) 中列出了最終篩選進入模型的變量和其參數。其中顯著性一列表示相應變量在模型中的 p 值， $exp(B)$ 和 95% CI for $exp(B)$ 表示相應變量的 *OR* 值和其 95% 可信區間。對於採取迴避策略次數 (number of avoidance pauses) 和使用同義詞進行迴避的次數 (synonym pauses) 這兩個變量，*OR* 值的含義如下：

表 11
影響翻譯能力的變量

步驟 2 ^a	方程式中的變數						<i>exp(B)</i> 95% 信賴區間	
	<i>B</i>	<i>S.E.</i>	<i>wald</i>	自由度	顯著性	<i>exp(B)</i> 下限	上限	下限
	迴避停頓的總次數	-0.249	0.063	15.486	1	0.000	0.780	0.689
同義詞停頓	0.661	0.278	5.637	1	0.018	1.936	1.122	3.339
常數	2.001	0.517	15.007	1	0.000	7.398		

a. 步驟 2 上輸入的變數

(四) 由於 $B = -0.249$ ，採取迴避策略次數 $\exp(B) = 0.780$ ，即 $\Delta \text{odds} = 0.780$ ，表示採取迴避策略次數多的研究對象與採取迴避策略次數少的研究對象相比較，前者是 B 組的機率是後者的 0.78 倍。這也就是說，翻譯中使用迴避策略越多，譯者是 B 組的可能性越小。

(五) 由於 $B = 0.661$ ，使用同義詞進行迴避的次數 $\exp(B) = 1.122$ ，即 $\Delta \text{odds} = 1.122$ ，表示使用同義詞迴避次數少的人與使用同義詞迴避次數多的人相比較，前者是 B 組的機率為後者的 1.122 倍。這也就是說，翻譯中使用同義詞迴避策略次數越少，譯者是 B 組的可能性越大。

由於上述兩個變數皆達顯著 ($p < 0.05$)，故此筆資料中「翻譯能力的高低」與「採取迴避策略次數」及「使用同義詞進行迴避的次數」有直接關係，即翻譯能力高的譯者採取迴避策略次數較少，且較少使用同義詞進行迴避。

伍、討論

一、譯者翻譯速度和迴避停頓上的個體差異

表 1 顯示，B 組比 A 組平均花較少的時間完成兩篇翻譯，也比 A 組停頓更少的時間。這符合我們的一般認知，即程度高的譯者翻譯速度較快。另外，表 1 中的全部處理時間、全部停頓時間及積極寫作時間的標準差和標準誤平均值均較高，這說明不論是 A 組還是 B 組，每位譯者翻譯過程均差異很大，有的譯者很快完成翻譯，有的又很慢；有的譯者經常停下來，有的一氣呵成。這個研究結果基本與 Dragsted 與 Carl (2013) 的結果相符合，即譯者不論其翻譯能力如何，其翻譯行為不會因為原文難度或種類的變化而產生很大變化。雖然本研究當中所選的兩篇原文在研究人員看來難度相當，但是對於譯者有可能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兩篇原文寫作風格上面也存在著一些差異，有可能造成譯者個體之間的差異。由於本研究並非要專門分析 A 組和 B 組在翻譯時間上的差別，再加上本研究中研究對象共 40 人，分成兩組，每組 20 人，在樣本數量上並不高，若樣本數量增加到 30 人以上，或加入其他國家的翻譯樣本，結果有可能不同，這是未來研究或許能改進之處。

造成翻譯中個體差異的原因比較複雜，訓練方式、個人習慣、翻譯經驗 (Carl & Kay, 2011; Jakobsen, 2002; Rosa et al., 2018) 等等均有可能，目前在這方面並沒有一致性的結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沒有必要去追求所謂翻譯行為上的共同模式。正如 Dragsted 與 Carl (2013) 所發現，專業譯者或者其他程度的譯者，都有可能是關注全域的譯者或關注局部的譯者，但這些都不影響他們翻譯能力的發揮。在研究翻譯過程當中，譯者在停頓的時間上的差異並不重要，翻譯速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停頓的時候在做什麼。

以往研究顯示，學生譯者和專業譯者在停頓時行為上有不少差異，如查詢、輸入、輸出行為等 (Carl & Kay, 2011; Olalla-Soler, 2018)。本研究首次對停頓過程中譯者採取迴避進行專門研究，研究結果 (表 11) 顯示，在停頓

過程中，B 組因採取迴避而停頓的次數也遠遠比 A 組要少，這一結果具有實際翻譯教學上的意義。如果我們要提高 A 組的翻譯速度和品質，可以用 B 組停頓時的行為作為參照，幫助 A 組減少因思考採取何種迴避策略而停頓的時間，這樣既可以幫助他們加快翻譯速度，又能提升翻譯品質。最後，在停頓過程當中，譯者是否採取迴避策略以及採取何種迴避策略，都是譯者認知心理活動的體現，未來研究如果能夠更進一步將譯者的認知心理活動與具體翻譯行為相結合，將會增進我們了解翻譯過程中的心理活動。例如，我們可以研究譯者翻譯過程中查詢的結果是否會影響迴避策略的使用，這將會是有趣的研究主題。

二、專業譯者和學生譯者的迴避策略特徵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對於 B 組和 A 組的迴避策略進行區分和描述，研究的總體結果顯示，兩組譯者或多或少都有使用全部八項迴避策略，而且在每篇翻譯中都使用了各項迴避策略（見表 3）。B 組採用迴避的總次數並不高，而且對每一種迴避策略的使用也都不高，他們使用最多的是迴避短語動詞，而 A 組在各項迴避策略的使用上都比 B 組要高，每篇翻譯使用次數平均達 21 次之多，他們使用最多的是上義詞迴避，以及迴避短語動詞。顯然，迴避使用短語動詞是兩組譯者共同的一大迴避策略。在下列的例一至例三的原文中，黑體字部分的為動詞，但是除了 2.1 和 3.1 的專業譯者使用了短語動詞（粗體字）之外，在其他所有的動詞的翻譯中，不論是學生譯者還是專業譯者都沒有使用短語動詞。在譯後訪談的時候，我們詢問譯者對一些短語動詞用法的了解，例如減重可以用“**shake off weight**”，產生反抗可以用“**fight back**”，貯存可以用“**pile up**”等。A 組回應少數英語短語動詞沒有聽說過，大多數的短語動詞他們都有學過，他們不使用這些他們學過的短語動詞，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握。而在 B 組的回應中，大多數都知道這些短語動詞的存在，只是他們認為，使用短語動詞會讓譯文顯得不夠正式。

表 12

例一

原文：當你用粗魯、不符合本性的方式減重時，身體會自然產生反抗，

譯文：

1.1 When you lose weight in a violent, unnatural way, your body would naturally resist it, [專業譯者]

1.2 If you use wrong way to lose weight, your body will resist naturally. [學生譯者]

表 13

例二

原文：據我觀察，……親子之間深層的知心談心或許就會出現。

譯文：

2.1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a profound conversation might **take plac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專業譯者]

2.2 By my observations, ...deep intimate parent-child exchange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學生譯者]

表 14

例三

原文：最好把握各種機會，多貯存一些資產，

譯文：

3.1 one must **make full use of** one's opportunities to accumulate more "assets" [專業譯者]

3.2 you had better to get the chances, and save money. [學生譯者]

3.3 One should better cherish every opportunity to store assets. [學生譯者]

以往有不少對於英語寫作中學習者英語能力和迴避策略關係的研究（El-Dakhs, 2016；Ghabanchi & Goudarzi, 2012；Hulstijn & Marchena, 1989；Liao & Fukuya, 2004），也有比較專業和非專業組迴避策略的研究（Dagut & Laufer, 1985；You, 1999），所形成的共識是，學習者或譯者的英語語言能力

與他們所採用的迴避策略有一定關係，程度較高者所使用的迴避策略會比程度較低者少。在短語動詞迴避上，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這一看法。另外，前人研究指出，造成迴避短語動詞的原因有可能是譯者不知道短語動詞的存在（Dagut & Laufer, 1985；Liao & Fukuya, 2004），或是因為母語與英語差別太大（El-Dakhs, 2016；Ghabanchi & Goudarzi, 2012；Hulstijn & Marchena, 1989；Liao & Fukuya, 2004；You, 1999）等等。但是我們的研究卻發現一些新的影響 A 組或 B 組迴避短語動詞的原因，例如 A 組可能是對短語動詞沒有把握，B 組則是認為短語動詞會讓譯文不夠專業。在本研究中對短語動詞無知的因素並不存在，在我們所判定的迴避停頓中，所有譯者都知道有相應的短語動詞可以用，但卻沒有使用。因此，本研究比較傾向於認為 A 組較少使用短語動詞可能是因為中文與英語差別太大，而 B 組迴避使用短語動詞可能與他們習慣於母語的表達方式有關，亦即中文並沒有短語動詞的形式。

很多學者建議（Dagut & Laufer, 1985；Liao & Fukuya, 2004），母語中文的學習者在使用英語時，應增加英語短語動詞的使用，這樣有助於提升寫作品質。然而，針對有些文本類型和風格，使用單字動詞的確比短語動詞要正式（例如，就英文學術寫作來說，“tolerate”比“put up with”要正式），而且 B 組和 A 組在中翻英過程中迴避短語動詞的原因不同，是否應該增加短語動詞，B 組需要視寫作的風格以及修辭而定。

三、學生譯者和專業譯者在迴避策略上的差異

本研究比較了 A 組和 B 組在迴避策略上的差異。研究發現，A 組在每項迴避策略的總體使用上都與 B 組有顯著的差異（表 4）。除了短語動詞之外，A 組比 B 組使用更多上義詞迴避策略，而且差異顯著（表 3 和表 4）。我們將兩組譯者在每篇翻譯過程中使用迴避策略是否有顯著差異（表 6 和表 8）總結形成表 15。表 15 顯示，在六項詞彙迴避策略中，上義詞迴避是唯一兩組譯者在兩篇文章翻譯中都呈現顯著差異的迴避策略。

表 15

兩組譯者兩篇文章翻譯中呈現顯著差異的迴避策略

原文	上義詞	近似 表達法	同義詞	母語 遷移	迂迴 或改述	迴避短語 動詞	關係 子句	被動 語態
第一篇	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顯著	不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第二篇	顯著	顯著	顯著	不顯著	顯著	不顯著	顯著	顯著

所謂的上義詞迴避，就是指使用更加籠統的，範圍更大的一個字來避免使用比較精確的字，範圍較小的詞彙，如果上義詞使用過多就會造成翻譯中用詞過於籠統，模糊不夠精準。在下列例四中，「蟲鳴鳥叫」和「天籟」本身就構成了上義詞和下義詞的關係。很多 A 組都只是翻譯出上義詞（「天籟」），而不翻譯「蟲鳴鳥叫」。而 B 組大多都翻譯出來「蟲鳴鳥叫」，有些有翻譯上義詞「天籟」，有些沒有。這個例子比較特殊，因為上義詞和下義詞都同時出現在原文中，但我們從這個例子的翻譯當中可以看出，B 組比較重視翻譯比較精確的下義詞，A 組翻譯的比較籠統，只翻譯上義詞。對例五中的攀岩一詞的翻譯中，A 組很多都使用上義詞“mountain climbing”進行翻譯，把攀岩當成爬山的一種；而 B 組會使用較準確符合原文的“rock-climbing”來進行翻譯。

表 16

例四

 原文：只是單純享受微風吹過的感覺，蟲鳴鳥叫的天籟

譯文：

4.1 enjoying the touch of breeze and the song of nature. [學生譯者]

4.2 simple enjoying the brush of the breeze and the heavenly sounds of the Nature. [學生譯者]

4.3 but to enjoy the feeling of the wind blowing and natural sound voiced by worms and birds.
[專業譯者]

4.4 Instead, they just enjoy the breeze and the sounds of bugs and birds. [專業譯者]

表 17

例五

原文：另外，若全家能一起溯溪、攀岩，一起面對困境與挑戰，

譯文：

5.1 In addition, if the whole family can go mountain-climbing and [學生譯者]

5.2 when the whole family goes mountain climbing or river rafting. [學生譯者]

5.3 if the whole family can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such as rafting or rock climbing and fac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gether. [專業譯者]

5.4 ... when the whole family sight-see lakes, rock-climb, and generate a sense of solidarity in face of hardships or challenges. [專業譯者]

上義詞迴避在以前英語寫作與翻譯研究中沒有過多的文獻。本研究在譯後訪談中發現，學生譯者都有學習過英文中諸如“song of birds”與“song of nature”，“rock climbing”和“mountain climbing”等具有上義和下義關係的詞，他們也知道這些詞之間存在上義詞和下義詞的關係，他們認為在翻譯中使用上義詞比較「保險」，原因主要是他們比較熟悉上義詞，有學生譯者回答稱不是很確定「蟲」要怎麼翻譯，也有學生譯者回答稱不知道「叫」和「鳴」要怎麼翻譯，從而影響了他們翻譯下義詞的意願。而 B 組清楚知道詞義的上下義關係，掌握的上義詞、下義片語比較多，能夠按照原文選擇較為準確的詞彙進行翻譯。兩組譯者的差別就在於此。

在中英翻譯教學中，對於沒有對等的詞彙使用上義詞進行翻譯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翻譯技巧。但在本研究中，譯者多使用上義詞，迴避下義詞，主要是因為他們所掌握的詞彙不夠。因此，問題的本身並不是翻譯問題，而是 A 組的基本英文能力問題，在翻譯教學當中，應該更強調譯者如何記憶更多的詞彙。

本研究 A 組比 B 組使用更多迴避策略，也許能從前人這方面的研究結果找到一些關聯。Scarpa (2020) 指出，專業譯者和新手譯者都會把直譯當作第一選項。專業譯者如果沒有遇到翻譯不出來的情況，會首先將直譯的版本

當作預設的譯文，而新手譯者在遇到翻譯困難時，會從字對字翻譯的一個極端跳到完全陌生化翻譯（使用完全變體的詞彙）的另一個極端。首先，本研究中，使用迴避策略都是譯者面臨翻譯困境時所採取的權宜之計。B 組也許遇到的翻譯困境比較少，因此沒有必要採用迴避策略，而 A 組遇到的翻譯困境較多，因而採用較多迴避策略，他們的翻譯要麼採用逐字翻譯，不然就搭配一些較不常見的用法。例如，把「天籟」翻譯成“song of nature”。

當然出現這樣的研究結果，也有可能是受到一些隱藏因素的影響，例如，兩組研究對象在英文能力上組間差異並非強烈，有一些 A 組程度較高的譯者與 B 組程度較低的譯者語言能力上（多益分數）相差不多。另外，我們選用兩篇原文供譯者翻譯，是考慮到如果翻譯時間太久可能會造成疲勞，但分成兩篇文章必然造成文章難度上的差異。雖然我們的原文經過語言專家的挑選，但畢竟無法作到難度完全一致。另外，我們的實驗分組人數較少。這些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都不可忽視。當然，所有譯者所持的翻譯的標準也不一樣，這也可能會造成他們在決定是否採用迴避策略時的差異。因此，儘管目前的研究表明 A 組比 B 組使用更多迴避策略，但對這個結果的詮釋應格外謹慎。後續研究也可以進一步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四、不同原文語篇對於迴避策略的影響

前人對於翻譯中迴避策略的研究發現，翻譯能力越高的譯者所使用的迴避策略就越少（Dagut & Laufer, 1985；Ghabanchi & Goudarzi, 2012；You, 1999），但以前的研究並沒有討論不同的語篇對迴避策略的影響。本研究嘗試用兩篇原文來比較兩組譯者翻譯時迴避策略的使用情況，如上表 15 所示，兩組譯者在兩篇文章的翻譯中，只有在上義詞迴避策略使用上都出現顯著的差異，而在其他詞彙迴避策略的使用上，有的在第一篇的翻譯中差異顯著，有的在第二篇的翻譯中差異顯著；在句法迴避之關係子句迴避和被動語態迴避上，A 組和 B 組在兩篇的翻譯中，分別呈現顯著的差異。

不少英語寫作研究指出，程度較低的學習者通常比程度較高的學習者使

用較少被動句 (Kleinmann, 1977; Marzouk, 1995; Seliger, 1989)。關係子句的英語寫作研究也顯示，母語非英語的學習者在英文寫作中使用的關係子句數量只有英文母語者的一半 (Bley-Vroman & Houn, 1988; El-Dakhs, 2016; Li, 1996; Zhao, 1989)，但這些研究對於低水準學習者是否迴避被動句或關係子句，則沒有一致的看法。本研究不同於以往的研究之處在於本研究有原文進行對照，當原文有被動句或關係子句時，如果譯者不翻譯成被動句或關係子句，本身就構成一個很明確的迴避訊號。而前人寫作研究中，如果學習者不使用被動句或關係子句，則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A 組比 B 組確實有較多迴避被動句和關係子句的傾向，如例六的原文為一句隱形的被動句。在翻譯中，不論 B 組還是 A 組大多都沒有迴避使用被動句，如譯文 6.1 和 6.2。而迴避使用被動句的基本上都是 A 組，如 6.3 和 6.4，B 組極少，如 6.5。

表 18

例六

原文：像這種親子相處的美好回憶，可以被稱為「魔幻時刻」。

譯文：

6.1 Such wonderful memories as parent-child contact can be referred to as a “magic moment”.
[專業譯者]

6.2 Such sweet memori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an be called “the magic moment”
[學生譯者]

6.3 The kind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memories like this, could call it “Magic Moment”.
[學生譯者]

6.4 Kind of this moment have good memory that we call it “The Magic Moment”. [學生譯者]

6.5 We call these wonderful memories shared by the parents and the children “magic moments”.
[專業譯者]

我們從譯後訪談發現，學生譯者採用其他方式翻譯被動句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被動句過於複雜。但從 6.3 和 6.4 來看，迴避被動句的原因與學生譯者

所述並不相符，在 6.3 的翻譯中，該學生譯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原文的被動句表達形式，而 6.4 的譯者很可能錯誤理解了原文。6.5 的專業譯者迴避被動句是因為用主動句比用被動句更恰當。雖然本研究不針對哪種譯文更加恰當，至少專業譯者使用的主動句句法正確，而學生譯者迴避了被動句卻造成句法錯誤。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A 組比 B 組確實有較多迴避關係子句的傾向，在譯後訪談中發現，A 組迴避關係子句則主要是因為不會用或怕錯，而 B 組迴避關係子句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照原文翻譯關係子句不能很好地表達原文的意思。例七原文中粗體字部分為關係子句的表達，可以直接翻譯成英文的關係子句。但在學生譯者的譯文 7.1 和 7.2 中，原文的這兩處表達，尤其是第二處表達，都沒有用關係子句翻譯，「這些浮現腦海的」在 7.1 中甚至沒有譯，在 7.1 中也翻譯不全。雖然專業譯者的譯文 7.3 和 7.4 都沒有用關係子句來翻譯「這些浮現腦海的」，但他們的句子確實都正確。

表 19

例七

原文：這些浮現腦海的記憶，可以適時地撫慰他們，成為支撐他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譯文：

7.1 these memorise **that come out** can console them timely, and **support them to go forward**.

[學生譯者]

7.2 **these memories** could soothing at this time and become their **motivation to move on**.

[學生譯者]

7.3 these memories **appearing in their brains** can console in due course and become the momentum **which keeps them going ahead**. [專業譯者]

7.4 this sweet moment **in their mind** can provide them with a piece of warmth as well as **support them to keep moving forward**. [專業譯者]

翻譯本身是很靈活轉換的過程，譯者在翻譯中應該視具體情況靈活翻譯，包括被動句及關係子句。譯後訪談和對以上例六和例七的分析說明，B 組採

取迴避策略時，是為了改進句子的結構，不會為了迴避關係子句而犧牲句子的正確性或造成原文意思丟失。而 A 組卻是在於方便行事和避免錯誤，他們之所以主動採用迴避關係子句的譯法，是因為對關係子句沒有太大把握，但結果卻造成譯文不完整。因此，在翻譯教學中，我們應該加強學生譯者關係子句方面的翻譯訓練，在可以主動迴避時就可以迴避，而在需要使用時則可以使用，真正作到收發自如。對於專業譯者來說，在必要的時候應該更加靈活的主動迴避關係子句。

五、翻譯能力與使用各迴避策略的多寡

本研究結果顯示，雖然 A 組和 B 組在所有迴避策略的使用上都有顯著的差異，但是同義詞迴避策略使用的多寡是唯一可以區分出 A 組與 B 組的變量，A 組使用的同義詞迴避高於 B 組。例如在第二篇的原文中，有「攝取過多熱量」，「減少消耗的熱量」等句，雖然大多數學生譯者能夠正確使用“calorie”一詞翻譯「熱量」，但很多學生譯者在翻譯不同句子時卻會使用其他的同義詞，如“energy”，甚至錯誤地使用“power”、“heat”等，而 B 組則基本上都準確使用“calorie”一詞，而且全篇譯文保持一致。

我們譯後訪談獲知，A 組並沒有實際掌握某些詞彙，因而在無法查字典的情況下變換同義詞，希望有一個用法能夠碰巧用對。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 A 組的用詞不一致，也不如 B 組精確。顯然，B 組在這個方面的表現要比 A 組更好，後者使用了太多模稜兩可的同義詞。這個研究結果對翻譯教學的啓示是，在我們要求學生靈活運用同義詞進行翻譯的同時，還需要指出一個最準確的詞彙，不要讓學生以為每個同義詞都是一樣的。當有各種選擇時，應該培養學生選擇最準確詞彙的能力。例如，在上述減肥健身語境之下的熱量，在英文中最恰當的是“calorie”，儘管該詞語是熱量的單位。

以往對詞彙迴避策略的英語寫作研究主要針對短語動詞（Blum & Levenston, 1977；Dagut & Laufer, 1985；Dulay & Burt, 1974；Hulstijn & Marchena, 1989；Laufer & Eliasson, 1993；Li, 1996），而非同義詞迴避。從

本研究結果來看，雖然在翻譯過程中，後者比前者以及其他詞彙迴避次數更有效區分 B 組和 A 組，但僅僅因一個同義詞迴避策略的差異，無法真正說明迴避策略使用與翻譯能力是否相關。A 組大量使用同義詞迴避也許是跟其語言能力比較低有關。我們的研究還顯示 A 組使用較多的上義詞進行迴避，把這兩項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學生譯者在用詞選字上與 B 組存在一定差距，這也是在教學當中應該想辦法幫助學生克服的一個困難點。

陸、研究結論

本研究回答了所提出之三個研究問題。從兩篇文章的翻譯來看，A 組翻譯每篇文章時採用迴避策略平均數遠多於 B 組。A 組採用最多的迴避策略是短語動詞迴避和上義詞迴避策略，B 組採用最多的為短語動詞迴避。

將兩篇翻譯合併起來看，兩組譯者所採用的迴避策略總次數以及每一項迴避策略的次數都有顯著差異，但在針對單篇文章的翻譯時，兩組譯者在同義詞、迴避短語動詞、近似表達法、迂迴或改述等迴避策略的次數上可能並沒有顯著差異。因此，研究中用來進行測試的文本顯然對譯者迴避策略的使用有一定的影響。譯者專業背景、對某個領域的熟悉程度，甚至中文原文寫作風格和表達方式都可能對譯者採取迴避策略有或多或少的影響。這些因素如果能在後續研究中加以關注，則可以更好地理解母語中文譯者採取迴避策略的原因，進而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更加有效地針對這些困難點加強學生詞彙和句法能力。

另外，本研究還發現，A 組和 B 組僅僅在使用同義詞迴避策略次數有顯著差異，因此，翻譯能力的高低與譯者使用迴避策略的多寡並無太大關連。翻譯能力較高的譯者在翻譯中也會遇到困難，只是他們使用迴避策略較為成熟，不會因為迴避而產生錯誤；而翻譯能力較低的譯者，雖然採用較多同義詞迴避策略，但很多該迴避之處沒有迴避。因此，翻譯能力較低的譯者，可以考慮減少使用同義詞進行迴避的作法，其次是掌握詞語上義和下義的關係，

多使用短語動詞，在翻譯關係子句和被動語態時，注意提升這些用法的正確性。

本研究招募了兩組譯者，但各組樣本不足 30 人，因此統計分析結果的信度可能受到影響，希望讀者在詮釋研究結果時給予謹慎和包容。本研究探討的迴避策略主要還是短語動詞跟上義詞，屬於語用學中比較淺層的現象，未來可以研究比較多種、更為深層類別的迴避策略，以增添研究的價值。另外，本研究所選的兩篇原文，雖然盡可能維持難度相當，但很難保證所有語言特徵高度相似，難免對研究結果造成一定影響。今後研究應擴大研究對象的人數，並對專業譯者的招募進行更嚴格的篩選。最後，本研究採用混合性研究方法，質化研究部分僅簡單地將訪談資料用來進行研究變量（迴避策略）的操作化定義（以針對停頓的訪談來判定是否有採用迴避），在研究結果及討論中所舉實例，亦僅能反映既定的研究變量，加之上述小型樣本的侷限，無法呈現發生迴避是否有更加廣義層面的代表性。後續研究如將研究重點移向質化研究，則可能發現新的變量，建立更深入的研究假設，並對研究結果提供更好的解釋。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司曉蓉 (2015)。〈中國大學生英語四級翻譯測試中分詞結構迴避現象探究——以獨立學院非英語專業大二學生為例〉。《湘南學院學報》，36(4)，59—63。

【Si, X. R. (2015). An empirical study on avoidance of participial adverbial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in CET-4: Taking sophomore in non-English majors as example. *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36(4), 59-63.】

林慧如 (2009)。〈論日譯漢之翻譯簡化〉。《編譯論叢》，2(1)，27—52。

【Lin, H. R. (2011). Simplification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2(1), 27-52.】

金曉玲、陳卓 (2011)。〈英語熟練程度對英語關係從句習得的影響〉。《外語與外語教學》，3，56—60。

【Jin, X. L., & Chen, Z. (2011). The effec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56-60.】

國偉 (2013)。〈中國學習者英語短語動詞迴避傾向的實證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36(4)，73—77。

【Guo, W. (2013).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learners' English phrasal verb avoidance tendency.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36(4), 73-77.】

趙鵬芳 (2011)。〈基於中國學習者英語語料庫的短語動詞習得研究〉。《湖南科技大學學報》，14(6)，114—117。

【Zhao, P. F. (2011). A study of acquisition of English phrasal verb based on 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6), 114-117.】

蔣秀玲 (2014)。〈中國學生關係從句產出的“動態性迴避”研究〉。《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6 (12)，98—100。

【Jiang, X. L. (2014). A study of “dynamic avoidance” from relative clauses by Chinese student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6(12), 98-100.】

英文文獻

Alves, F. (2003).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Vol. 45). John Benjamins.

Banfi, E. (2004).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Evidence from Italian as second language learned by Chinese peopl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2&3), 129-144.

Bley-Vroman, R., & Houg, C. (1988). Why do Chinese use few relative clauses in English? *University of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ESL*, 7, 93-98.

Blum, S., & Levenston, E. (1977). *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lexical avoidance in the speech and writing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and learners and in translation*. ERIC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https://eric.ed.gov/?id=ED139280>

Brown, H. D. (1994).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entice Hall Regents.

Carl, M., & Kay, M. (2011). Gazing and typing activities during tran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units of professional and student translators. *Meta*, 56(4), 952-975. <https://doi.org/10.7202/1011262ar>

Chiang, D. L. (1978). Predictors of relative clause production. In R. Scarcella & S. D. Krashen (Eds.),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142-145). Newbury House.

Chomsky, N. (1968). *Language and mind*. Harcourt, Brace & World.

- Corder, S. P. (1973). The elicitation of interlanguage. In J. Svartvik (Ed.), *Errata: Papers in error analysis* (pp. 36-48). CWK Gleerup.
- Dagut, M., & Laufer, B. (1985). Avoidance of phrasal verbs—A case for contrastive analysi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7(1), 73-79.
- Dragsted, B., & Carl, M. (2013). Towards a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yles based o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5(1), 133-158. <https://doi.org/10.17239/jowr-2013.05.01.6>
- Ducasse, A. M., & Maher, B. (2020). Teaching and assess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In F. J. Fornasiero, S. M. A. Reed, R. Amery, E. Bouvet, K. Enomoto, & H. L. Xu (Eds.), *Intersec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Establishing connections i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p. 401-417).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50925-5_25
- Dulay, H. C. (1982). *Language tw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lay, H. C., & Burt, M. K. (1974). You can't learn without goofing: An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cond language 'errors'. In J. C. Richard (Ed.), *Error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95-123). Longman.
- El-Dakhs, D. A. S. (2016). The lexical knowledge and avoidance of phrasal verbs: The case of Egyptian learners of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5(1), 132-144. <https://doi.org/10.7575/aiac.ijalel.v.5n.1p.132>
- Ellis, R. (1985).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is, R. (1994).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erch, C., & Kasper, G. (1980).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Interlanguage Studies Bulletin*, 5, 47-118.
- Ghabanchi, Z., & Goudarzi, E. (2012). Avoidance of phrasal verbs in learner

- English: A study of Iranian students. *World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2(2), 43-54. <https://doi.org/10.5430/wjel.v2n2p43>
- Göpferich, S. (2009). Towards a model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ts acquisitio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TransComp. In S. Göpferich, A. L. Jakobsen, & I. M. Mees (Eds.), *Behind the mind: Methods, models and result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pp. 11-37). Samfundslitteratur.
- Hulstijn, J. H., & Marchena, E. (1989). Avoidanc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1(3), 241-255.
- Irujo, S. (1993). Steering clear: Avoid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idio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31(3), 205-219.
- Jakobsen, A. L. (2002). Translation drafting by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by translation students. In E. Sánchez Trigo & Ó. Díaz Fouces (Eds.), *Traducción & Comunicación* (Vol. 3, pp. 89-103). Servicio de Publicacións da Universidade de Vigo.
- Kamimoto, T., Shimura, A., & Kellerman, E. (1992). A second language classic reconsidered—The case of Schachter's avoidance. *Interlanguage Studies Bulletin*, 8(3), 251-277. <https://doi.org/10.1177/026765839200800305>
- Kleinmann, H. H. (1977). Avoidance behavior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27(1), 93-107.
- Krashen, S.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rgamon Press.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arson-Freeman, D., & Long, M. H.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Longman.
- Laufer, B. (2000). Avoidance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effect of L1-L2 degree of similarity. *Studia Linguistica*, 54(2), 186-196.

- Laufer, B., & Eliasson, S. (1993). What causes avoidance in L2 learning: L1-L2 difference, L1-L2 similarity, or L2 complexity?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5(1), 35-48.
- Laviosa, S. (2014).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Pedagogic approaches explored*. Routledge.
- Leijten, M., & Van Waes, L. (2006). Inputlo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logging of on-line writing processes in a Windows environment. In K. Sullivan & E. Lindgren (Eds.), *Computer key-stroke logging and writ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Vol. 18, pp. 73-94). Elsevier.
- Li, J. (1996). Underprodu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voidance: Investigation of underproduction using Chinese ESL learners. In L. F. Bouton (Ed.),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pp. 171-18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Liao, Y., & Fukuya, Y. J. (2004). Avoidance of phrasal verbs: The case of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54(2), 193-226.
- Littlewood, W. (1984).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lassro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zouk, G. E. (1995). Avoidance or some other strategy: A case for the passive in Arabic and English. *TEANGA: The Irish Year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 113-125.
- Mees, I. M., Alves, F., & Göpferich, S. (2009). *Methodolog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 tribute to Arnt Lykke Jakobsen*. Samfundslitteratur.
- O'Brien, S., O'Hagan, M., & Flanagan, M. (2010). Keeping an eye on the UI design of translation memory: How do translators use the concordance feature? In M. Neerincx & W. P. Brinkman (Eds.), *ECCE'10: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annual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ergonomics* (pp. 187-190).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

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alla-Soler, C. (2018). Us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solve cultural translation problems: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4(6), 1293-1317.

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 Group. (2005).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a*, 50(2), 609-619.

Ringbom, H. (1987). *The role of the first languag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Vol. 34). Multilingual Matters.

Rintell, E. (1979). Getting your speech act together: The pragmatic abilit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17, 97-106.

Ronowicz, E., & Imanishi, K. (2003). A Comparison of task management and lexical search mechanisms in novice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Interpretation Studies*, 3, 16-34.

Rosa, R. N., Sinar, T. S., Ibrahim-Bell, Z., & Setia, E. (2018). Pauses by student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6(1), 18-28.

Scarpa, F. (2020).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Schachter, J. (1974). An error in error analysis. *Language Learning*, 24(2), 205-214.

Schaeffer, M., Carl, M., Lacruz, I., & Aizawa, A. (2016). Measuring cognitive translation effort with activity units. *Baltic Journal of Modern Computing*, 4(2), 331-345.

Seliger, H. (1989). Semantic transfer constraints on 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passive by Hebrew-English bilinguals. In H. Dechert & M. Raupach (Eds.), *Transfer*

in language production (pp. 21-34). Ablex.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 209-231.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S. Gass & C.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35-253). Newbury House.

Tarone, E. (1980).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eigner talk, and repair in inter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30(2), 417-428.

Tarone, E. (1981). Some thoughts on the no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ESOL Quarterly*, 15(3), 285-295.

Trosborg, A. (1987). Apology strategies in natives/non-nativ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2), 147-167.

Wongranu, P. (2017). Errors in translation made by English major students: A study on types and causes. *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8(2), 117-122.

You, Y. S. (1999). Avoidance phenomena of phrasal verbs by Korean learners of English. *English Teaching*, 54(3), 135-155.

Zhao, R. (1989).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relative claus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 error in “an error in error analysis”. *Ideal*, 4, 105-117.